

天津报刊对鲁迅逝世的多维呈现*

李文健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鲁迅逝世后,《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天津报刊对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并组织编辑了系列纪念文章缅怀鲁迅先生的成就和贡献。这些报道和纪念文章视角多样,立场也多有不同,从公共意义到个体价值,从中国作家到世界文豪,从现实情感到精神更新,呈现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鲁迅形象。

关键词:鲁迅;天津报刊;公共舆论;纪念鲁迅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5-0072-0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由于距离遥远,天津并没有发起类似上海的万人公祭大会。集会性质的纪念活动见诸报端的,只有11月1日由青玲艺话团、海风诗歌小品社、草原诗歌会等团体发起的“鲁迅先生纪念会”。相较于平静的小规模纪念活动,天津本地以各大报纸为代表的舆论界,则对此投注了很大的力量。观察的角度从报道鲁迅先生的生前身后,到各界的纪念活动,再到组织编辑系列纪念文章,不仅全面展示了鲁迅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近历史的更大可能和多元认知的框架。

一、身后哀思:公共的和个体的

鲁迅先生逝世后,作为公共舆论的报刊媒体在第一时间即投入了关注。1936年10月20日,包括《大公报》《庸报》在内的很多天津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鲁迅逝世的讣告。《大公报》以间隔仅几小时的发自上海的两篇消息,迅速报道了鲁迅逝世

前后的简况和治丧情况。《大公报》在发自19日晚8时的专电中,引述许广平的话向读者展示了鲁迅生前的最后时光,“据鲁迅妻许广平女士谈,鲁病肺很久,经调养渐愈,本拟赴日本休养,因遵医嘱留沪,月初健康大复,已照常写作看书访友,国庆日曾往影院观《复仇艳遇》影片,十七日午后往内山书店访内山,归来受风寒,当夜失眠。十八日晨寒热大作,咳嗽亦烈,先延日医须藤诊治。十八日午后更由福民医院松井等会诊,即注酸素,迄鲜效果。十九日晨四时仅呼‘要茶’,五时二十五分逝世。时仅伊及鲁迅之弟周建人暨日籍看护等三人在侧”^[1]。20日零时的第二则专电中对治丧情况作了简要介绍:“由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内山完造、史沫德等组治丧委员会。治丧处由黄源、胡愈之负责,定二十日展九时起,至二十一日午后二时止,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二十一日午后三时大殓,二十二日展十时运万国公墓安葬。”^[1]

* [收稿日期]2015-04-18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XC2013-004)“大众传媒与近代天津城市社会”

[作者简介]李文健,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师,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庸报》在10月20日的讣告中称鲁迅先生的离世为“国际文坛陨一巨星”。在对其生平事迹的简要介绍中,《庸报》肯定了鲁迅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领袖地位,称其为“五四时代青年思想之权威”^[2]。《益世报》则冠以“当代第一流文豪”,除了发布遗照、遗嘱,还刊登了主治医生的诊断报告,详细描述了鲁迅从发病到死亡的诊疗情形。^[3]

对鲁迅的葬礼,《益世报》更是以航空通讯的形式报道了全部过程,笔调哀伤。“(22日)时光在凄凉的气氛中消逝,一点五十分开始举行盖棺仪式”,许广平“扶着孩子海婴饮泣”,“闻者莫不心酸”。“二时出殡”,由胡风、巴金等扶灵,“送丧的人足足有八千多人”,“多是年轻的男女学子与工人”,沿途“送丧者都高唱挽歌,又悲惨又雄壮”。到达虹桥路万国公墓后,在公墓纪念堂前又进行了最后的葬仪,蔡元培、宋庆龄等发表了演说,最后覆盖着“民族魂”旗的灵柩在众人的注视礼中下葬。^[4]

《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主流报刊对鲁迅身后事的具体报道,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在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知识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重大的突发新闻事件,天津报刊对于鲁迅逝世的关注亦是新闻规律使然。尽管在记者的报道文字中,哀伤、崇敬的情感认知随处可见,但事无巨细地描述恐怕同样也是满足远离事件现场读者的一种新闻方式。甚至实事求是地说,对于部分读者而言,报道中的新奇感可能要远大于鲁迅离世带来的所谓感情冲击。作家王余杞对此有过辛辣的讽刺:那些“只有上班签到,抽烟喝茶,‘今天天气哈哈’,摇头吟味报屁股”,甚至误认鲁迅为外国人的“充满了死气沉沉的公事房”的人,“任何的文艺工作者向来不曾引起他们注意过。如果注意了,那便是:‘每不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则有之’”罢了。^[5]以此可以推断,很多报纸的普通读者期待看到众多名流参与的规模宏大的追悼活动和葬礼,除了如鲁迅文《药》中“簇成一个半圆”“脖项都伸得很长”般地“好奇”和“观赏”,大概也别无其他了。这恐怕才是知识青年所感最为悲愤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报界对鲁迅身后事的关注并没有全部放在堆砌哀荣之上,《益世报》的另一份副刊

《别墅》刊出了一篇《鲁迅夫人访问记》,详细记录了记者对鲁迅北京原居所的探访。此处的“鲁迅夫人”是鲁迅的原配朱安。文中对朱安的刻画极其细致:“鲁迅的夫人,身材很矮,脸色很清口,眼睛里流露着极其哀伤的神态,看年纪也有半百开外了,她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青裤,白鞋白袜白带裹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6]。在谈及鲁迅的逝世时,朱安的语音“变得非常低微,低微得使人听不见。至于后事,尚还没有什么打算,因为那里有他的家眷主持一切”。因朱安悲伤不能自己,记者只能中断了对她的采访,“恰巧鲁迅先生的二弟苦雨斋主周作人先生也在这里,笔者便向他去探寻一切”。周作人在采访中,对鲁迅亦有自己的评价,“他近数年来努力于旧的文学方面上的工作,其余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事情。说到他的思想方面,个人的见解是非常深的,对于一切的事,仿佛都感到很悲观。……他的个性是倔强得很,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对自己是否有不利的地方。”^[7]

记者访问的朱安和周作人,可称作是鲁迅的至亲。然而众所周知,朱安和鲁迅之间基本没有夫妻感情,甚至鲁迅只把朱安看作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旧式婚姻的痛苦给鲁、朱二人都带来了莫大的伤害,特别是目不识丁只能依靠丈夫供养的小脚女人朱安,其苦闷甚至悲凉显然是难以言表的。在记者的记述中,瘦小的身躯、“低微的语调”以及谈话中暗有所指的在上海主持一切的“家眷”,似乎更加增添了朱安作为旧式婚姻殉葬者的悲情。而鲁迅和二弟作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也曾备受关注。尽管,周作人对于鲁迅在文学和思想上的成就亦表示认同,但对于兄长所谓“多疑”的性格实际上却不无微词。通过这篇报道,尚无法准确判断作者的实际意图,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还是不免让人心生疑惑。而报纸副刊的编者把这篇文章放到了《益世报》的综合性游艺副刊中,与各种电影介绍、名伶演出预告并列,其迎合都市一般读者的消费性倾向则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如果后来的研究者只把这些纷纭复杂的身后事看作报人的“促销手段”,显然是误入歧途。

在过往的研究中,尽管很多前辈的研究者试图从多个面向终结意识形态和政治统领的研究方法,但鲁迅研究的符号化倾向依然存在。在革命伟人和文化巨人的绝对权威之下,以朱安为代表的失语者都“自然而然”地被湮灭了。这些选择性遗忘,对于研究本身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更不利于把鲁迅研究引向深入。正是通过《鲁迅夫人访问记》看似无关宏大叙事的微末记载,我们才有机会透过另外一个视角审视鲁迅逝世在其他层面的意涵,如同朱安自己所言,她也是鲁迅“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对此类个体化的遗产做出符合历史情境和当代关怀的解读,有益于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和视角回归历史并全面还原鲁迅,这恐怕也是研究者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一代文豪:中国的和世界的

如果说,对鲁迅丧葬情况的详细记录多半是出于报人“有闻必录”的职业敏感,那么其后诸多纪念文章的发布则颇有盖棺定论的意味。尽管在各报的讣告中也有对于鲁迅生平的简要介绍和评价,但这些片段式的文字与完整意义上的鲁迅形象相去甚远。鉴于鲁迅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各报均以各种副刊和专页为载体,发表了大量纪念和评论文章。《大公报》副刊《文艺》和《益世报》副刊《语林》还特别出版专号加以纪念。这些文章中,既有文坛宿将的评价和缅怀,也有彷徨中的知识青年的认知和追思,甚至还翻译了一些东西方外国友人的纪念文字。通过这些纪念文章,我们一方面可以深刻认识鲁迅先生在那段历史中留下的身影和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同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作者对鲁迅的评说,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意涵宽广的多维“合成”影像。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对于他的纪念首先就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和缅怀。魏东明在纪念文章中,直言鲁迅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这种评价应当说是十分中肯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鲁迅的文字向来被视为新文学进步的标识。在谈到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魏东明对其开创性的贡献充满敬意,“这篇小说在

现在看来还是成熟老辣,充满了反抗的呐喊的,……它在当时影响之大,震动读者之甚,想象起来是使我们兴奋的”。鲁迅早期的其他作品,如《药》《孔乙己》《阿Q正传》也被作者视为“新文学运动初期运动史中光辉的几页,是最宝贵的收获也是文坛上不朽的作品”。对于小说的思想内涵,魏东明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正反映着那个时期的反封建的精神,是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凝固在文艺方面的结晶”。在魏文看来,鲁迅的另外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发挥过极大的直接作用的”,“用锋利泼辣的文字写出的短小精悍的杂感文”,“这些杂感都是时代的纪念碑,我们可以从这些里看到五四及三一八的血迹”。鲁迅南下之后,在同创造社的论战和对帮闲文人的批判中,“由群众的朋友,进为群众的兄弟”,并“支持了翻译方法的论争,播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坚实的种子”。魏文把和青年一起工作、支持青年的文学创作,也同样视作鲁迅在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田军和萧红等“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往往是经过鲁迅先生的手介绍给读者的”。^[8]

魏东明的纪念文章,从新文学创作、文艺思想和提携后进等几个方面,对鲁迅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进行了全面评价,文中充满了赞美和景仰,这代表了那个时代众多文人、知识分子对鲁迅的一般认知和理解。尽管后期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也曾攻击鲁迅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中国的堂吉珂德”,但这种近似于人身攻击的所谓批判,实在不能对孤军奋战的鲁迅造成实质上的威胁。相反,鲁迅在论战中表现出的从容和理性,以及“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深刻认识,则生动地观照出了创造社的左倾幼稚病。很快,随着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的成立,青年作家们重又聚集在鲁迅周围,开启了有组织的革命文学运动。

当然,魏东明对引领者的歌颂也许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艺界的评价和认识,那么一直对左翼文学颇多批评的新月社文人叶公超的言说,其立论和评价则可能更有意义。叶公超认为,鲁迅在三个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第一,在小说史方面,“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闲钞,不但在当时是开

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第二,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伤逝》《社戏》都是叶公超所推崇的。尽管叶氏对于鲁迅的小说有创作方式上的批评,但看到“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口已没有他的书了”的状况一定也使其颇感意外,因此计划“在将来把他的小说全部仔细地读读,以补充或纠正现在的印象”。第三,是鲁迅运用文字的能力,“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9]叶公超对鲁迅的政治立场和创作思想显然不能认同,因而他把自己总结的鲁迅形象称为“非战士的”,以区别于左翼作家眼中的所谓革命导师形象。

另外一位和鲁迅有过交锋的新月社成员梁实秋,比之“小心翼翼”的叶公超,则直接和坦率得多。他直言赞同钱玄同关于鲁迅“多疑”“轻信”和“迂怒”的评价,尽管曾受到鲁迅“不断的攻击”,“不过在当时自称左翼作家的一群人中,我还是比较的最佩服鲁迅先生”。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梁实秋也不乏赞美之词:“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上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10]

叶公超和梁实秋都曾和鲁迅有过论战,可见在文学创作以及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对于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叶梁二人非但没有贬低,相反却赞颂有加,这也足以证明鲁迅作品在文学上的魅力。关于鲁迅先生在晚年的所谓“转变”,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大公报》的一篇悼词,指鲁迅“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而是“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9]尽管对于所谓作家“浪费生命”深感悼惜,但当读到鲁迅等左翼作家与周瘦鹃、包天笑等“星期六派文人”联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其中为救国难尽弃前嫌的“国民立场”,亦着实令梁实秋感到“足以表示鲁迅先生的伟大”,并“值得所有的人的称赞”。^[10]从这个细节来看,虽然以叶、梁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和鲁迅

在文学思想上有相当大的差别,但由日渐沉重的民族危难而引起的焦虑感和责任感,对那个时代的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则是毫无差别的,这可能也是鲁迅和原本创作立场不同的时代作家们之间最大的交集。

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丰富遗产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讣告中屡次出现的“世界一流文豪”实非谰言,鲁迅的逝世确为世界文坛的一大损失,这从诸多国际友人或研究者的谈话和纪念文章中可见一斑。曾把《故乡》等作品介绍给日本读者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佐藤春夫,在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痛心非常。他认为鲁迅“虽受有近代西洋文明之感化,但绝无违背东亚人之精神”,在文学上实堪为“现代第一流之作家,在日本尚瞧不到能与鲁迅对抗之人物”,甚至预言“从此以后日本文学亦将受其影响”^[11]。

另一位日本学者改造社创始人、社长山本实彦因和鲁迅有过长期的交往,对于鲁迅的认识则更加深刻。他认为鲁迅在权力上是地位“超然的”,而文学风格则是“罕有的”,“鲁迅氏的存在,比较高尔基的存在,尤其清高”,并且“和萧伯纳是大异其趣的”。这种罕有的不同于同时代世界文豪的风格,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生活的中国社会的不同,“他生在不舒适的中国,又度着不舒适的生活,而处之怡然,向自己的信仰途中迈进,委实是令人敬佩的”^[12]。山本实彦对鲁迅文学成就的推崇,最终促成了第一部“鲁迅全集”,即七卷本《大鲁迅全集》在日本的出版。这部日文版《大鲁迅全集》甚至比中国国内最早的由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山本实彦对于鲁迅文学的国际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方的文人学者中同样不乏鲁迅的推崇者,他们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亦有很高的评价。为此《大公报》副刊《文艺》还推出了“英美人怎样论鲁迅”专页予以选录。以报告文学集《红星照耀中国》闻名西方世界的斯诺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可以比拟于“苏联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曼罗兰、巴比塞,今日的A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作家”,自开创中国

白话文学的基础始,“他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导,直到逝世”^[13]。曾任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的谢迪克(H. E. Shadick)在纪念文章中细数了《阿Q正传》《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在创作上的特点,并盛赞鲁迅过人的“写作才力”。诚然鲁迅作品中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是深刻甚至是狠辣的,然而谢迪克敏锐地意识到,“虽然他有坚强的意志,要勇敢而暴力地扫除一切空虚和虚伪,一切阻碍民族复兴的恶势力”,但在意志的背后却是他“对于人类的热爱”,这种“明晰的现代眼光与传统的信仰的冲突似乎大大地把鲁迅的心困扰着,而这也是他的彷徨之所由来”^[14]。谢迪克的这种认识是十分精到的,在看似尖锐笔刃“刀刀见血”的刻画之下实际正是鲁迅作为“医者”的仁心。

从鲁迅逝世后编辑的一系列纪念文章看,《大公报》《益世报》等天津报刊对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肯定,甚至是推崇的。不过,报纸在选录纪念文章时,并未将那些在创作理念上与鲁迅格格不入的文人排除在外,事实上百喙如一的赞美之声则更加突出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对国际上鲁迅研究者和支持者意见的引介,则进一步把鲁迅引领中国文学的民族作家形象深化为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代文豪。因此,在报人的视角中,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颇有些世界主义色彩的认知,实际却在旁观必审中超越了简单的政治论争和笔墨官司,而最终成为人们共同缅怀鲁迅,继承鲁迅文学遗产的集体性体验。

三、情感诉求:现实的和精神的

社会名流们的琤琮之声当然更能凸显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但其中的卓尔不群却多少拉开了和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少了些同音共律的一般情感。这种“被神化”的观感实与纪念活动中数以千计的青年和群众的自发哀悼大相径庭——青年们更愿视鲁迅为导师和同志,而不是顶礼膜拜的所谓“先知”。这从为鲁迅逝世而谱写的挽歌中可见一斑:

你底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中国人的脸

你底声音是晨钟
撞醒了奴隶们争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你从不会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上新中国的前头
呵,导师
呵,同志
你死了在很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去
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没有死去
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安息吧
呵,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底墓前
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底志愿^[15]

以上所引挽歌中的哀伤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比之盖棺定论式的名家述评更能打动普通读者。因此,导师加同志式的情感诉求在报刊的纪念文字中所占比例也很大。这些文字一方面代表了普通知识青年对鲁迅突然离世的震惊、不舍和缅怀,另一方面也同时表达了他们追随“鲁迅道路”的精神和信念。此类文章部分刊登于综合性副刊和游艺副刊之中,其实也可以视为满足普通读者阅读旨趣的一种编辑方法。

实际上这些文学青年或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多和鲁迅并无生活中的交往,但在现实情感上却对鲁迅之死黯然神伤,甚至悲不自胜。一些人记述了自己得到鲁迅逝世消息后的情状,“我在得到他逝世消息后的晚上,(即是十九日的夜间)除了报馆,遇到几个青年朋友,我首先报告他们这不幸的消息,他们都始而惊愕,继则黯然”^[16]。在创作上曾深受鲁迅影响的诗人王亚平也在文章中回忆到,当看到鲁迅讣告时,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一由难过的情绪支配了我,使我坐立不安”^[17]。

对鲁迅逝世的切肤之痛有来自作为文坛后辈对前辈导师艺术滋养的感佩,这在诸多纪念文章中都有清楚的表示。而对很多视鲁迅为国家脊梁和社会明灯的广大青年而言,“在国难达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民族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使我们的心神极度紧张的时候”,突然失去“不屈不挠的革命的伟大的导师”之焦虑感,正是造成“惊愕”“黯然”“坐立不安”的深层原因。如周学普所言,作为中国革命中“前进的典型的战士”,“他的伟大的革命的基础是明澈的现实主义,不妥协性,强劲的战斗精神和对于被迫压的民族的深深的热情”,因此“在争斗中失了如此希(稀)有的导师,这给了我们的惊愕和悲痛是非常深刻的”^[18]。把鲁迅逝世和国难日深的意象相联系,从现实情感进而焕发精神更新,这才是心怀家国前途的青年们纪念鲁迅的真义所在。也因此,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少有“把‘怎样怎样伟大’来颂扬鲁迅先生”^[16]而刻意和社会名流相区隔,以证自己和那些“每日装模作样,不与凡人讲话”,即使“和凡人通一个电话,还要板着面孔”的所谓“绅士派文人”的不同。^[19]对于那些“藉死人以炫耀自己”甚至暗投“冷箭”之人,则给予坚决的回击,他们相信虽然“鲁迅先生死了,鲁迅先生的伟大功绩正在日日滋长,鲁迅先生的仇敌是无论如何巧语花言也掩埋不下的”^[20]。

关于鲁迅先生留给青年们的精神力量,王亚平的总结颇具代表性。他认为鲁迅留下了三个“药方”。其一,伟大的人格,“他始终执着一只反抗不屈的笔,在中国这个混淆黑暗社会里战斗。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却始终不屈服。反而,更向恶势力冲锋。他好似一个在黑夜执着火把向前猛进的战士”。其二,著述的勤苦,“他不是像某种文人的烂于写作,也不是想显名牟利”,“他是老老实实,道道地地的一个顶勤苦的著作者”。其三,热诚与胆量,“对于他仇视的环境,人们,是极尽其刻薄,冷酷的,而在反面(他希望的环境,亲爱的人们)却又是绝对的真诚,同情”,而“他在军阀下,恶势力下,不堪言状的危险恐怖环境里,依然矗立不屈,战斗到底”的精神才是“使我们伟大的希望达到最后的目的”的最终力量。^[17]

王亚平总结的这三个精神药方可谓洞见闾奥。实事求是地说,面对时艰国难部分青年人“不紧张也不兴奋,只是痛哭着悲啼着山路的难行,不是喊石子碰伤了我的脚了!就是嚷荆棘刺烂了我的腿!”^[21],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三个“药方”的确有助于苦闷中的青年打破内心的彷徨和彼此间无谓的论争,起到凝聚情感和集结力量的作用。

因此,青年们缅怀鲁迅先生文学成就的同时,把关注点延伸到情感和精神层面,从鲁迅精神中寻找信仰并汲取力量,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实不可小觑。在青年们的文章中,鲁迅也完成了从高山仰止的一代文豪到可亲可敬的精神导师的角色转换。

四、结语

由于社会名流的参与,特别是公共媒体的广泛报道,鲁迅逝世很快变为一场意义非凡的全国性公共事件。应当看到,《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无论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纪念文章的编排上,并未将鲁迅简单地政治化和标签化,而是凸显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和忠于自身思想的精神价值。《益世报》在社论中曾特别强调:“思想上的是非曲直,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对鲁迅先生所代表的思想,我们赞成与否,一般人赞成与否,另是问题。”^[22]报人的这种职业理念最终促成了“多声部合唱”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各界均参与发声的舆论场中,不仅可以发现普通读者对规模宏大的丧葬活动的关注甚至新奇,也能够看到中外文化界名人巨叟的赞颂,甚至一些思想上持论不同者的评论。同时作为追随者的一般知识青年也利用现代媒体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立场。当然不同群体对于鲁迅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但其中对鲁迅形象的多元认知,实际有利于研究者突破思维定势,更加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的鲁迅和鲁迅的历史,并回归到时代背景和现实关怀之中把握“鲁迅史”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鲁迅昨在沪逝世[N].大公报.1936-10-20.
- [2] 鲁迅昨病逝沪寓[N].庸报.1936-10-20.

- [3] 鲁迅昨逝世[N].益世报.1936-10-20.
- [4] 鲁迅殡葬志详[N].益世报.1936-10-24.
- [5] 王余杞.悲愤——因鲁迅先生的逝世而作[N].益世报·文艺周.1936-11-1.
- [6] 汪介夫.鲁迅夫人访问记(上)[N].益世报·别墅.1936-10-23.
- [7] 汪介夫.鲁迅夫人访问记(下)[N].益世报·别墅.1936-10-24.
- [8] 魏东明.纪念鲁迅先生[N].益世报·生活文化.1936-11-2.
- [9] 叶公超.关于非战士的鲁迅[N].益世报·追悼鲁迅先生专页.1936-11-1.
- [10] 梁实秋.关于鲁迅先生[N].益世报·追悼鲁迅先生专页.1936-11-1.
- [11] 佐藤春夫谈话[N].庸报.1936-10-20.
- [12] 山本实彦.鲁迅之死[N].庸报·另外一页.1936-11-5.
- [13] Snow.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N].大公报·文艺.1936-11-25.
- [14] Shadick.鲁迅:一个赞颂[N].大公报·文艺.1936-11-25.
- [15] 鲁迅先生挽歌[N].益世报.1936-10-24.
- [16] 乙木.鲁迅先生的死[N].益世报·语林.1936-10-21.
- [17] 王亚平.为追悼鲁迅先生更进一解[N].益世报·文艺周.1936-11-1.
- [18] 周学普.悼鲁迅[N].益世报·文艺周.1936-11-1.
- [19] 二目.谈追悼鲁迅[N].益世报·语林.1936-10-30.
- [20] 西村.哀悼纪念及冷箭——为黎锦明《追忆鲁迅先生而作》[N].益世报·文艺周.1936-11-22.
- [21] 新影.困难境遇下的青年应刻苦奋斗冒险前进[N].益世报·青年生活专页.1936-1-13.
- [22] 悼鲁迅先生[N].益世报.1936-10-21.

(责任编辑:朱德东)

The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in Tianjin's Newspapers about the Death of LU Xun

LI Wen-ji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death of Lu Xun, lots of well-rounded reports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or Lu Xun and series of articles about Lu's achievemen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of Tianjin including Ta Kung Pao, Socail Welfare Tientsin, and Moderation Daily. These reports and articl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different standpoints from the public significance to individual value, from a national writer to a literary giant in the world, from the emotion in reality to the spiritual renewal, showed a multi-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Lu Xun.

Key words: Lu Xun; newspaper in Tianjin; public opinion; commemoration of Lu Xun